

政治与法律思想史从第二辑
SECOND SERIES OF POLITICAL AND LEGAL THOUGHTS



宪政、理性与历史： 萧公权的学术与思想

张允起 著



社

宪政、理性与历史： 萧公权的学术与思想

张允起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宪政、理性与历史:萧公权的学术与思想/张允起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第二辑)

ISBN 7-301-09681-X

I. 宪… II. 张… III. 萧公权-学术思想-研究 IV. D09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5786号

书 名: 宪政、理性与历史:萧公权的学术与思想

著作责任者: 张允起 著

责任编辑: 李 晨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681-X/D·128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0印张 148千字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前 言

1959年12月中旬，一封由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会长布克哈特(Frederick Burkhardt)署名的书信传递到一位滞留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的华裔学者手中。该会决定授予这位学者“人文学术卓越成就奖”(Prize for Distinguished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在翌年1月20日于纽约举行的授奖仪式上，该会赞扬他“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精华”，说他年轻时著书论述西方政治思想，表现了“创造性的灼见”(creative insight)，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显示了“自辟蹊径的史识”(great originality of conceptualization)。该会认为他不仅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诗人、作家、哲学家(poet, writer, and philosopher)，称他平生任教，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赢得了学生的“经久爱戴”(enduring affection)。^①此人便是曾任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上的萧公权(Hsiao Kung-chuan)。

萧公权(1897—1981)早年留美期间专攻政治哲学，以*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政治多元论：当代政治理论研究》一文获得博士学位(1926)。此后，他一直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执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华盛顿大学等中外高等院校，在教授政治学、法哲学、中西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制度等课程的同时，留下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迹园文录》、《宪政与民主》、《自由的理论与实际》、《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China's Contribution to World Peace*)、《中国乡村：十九世纪的帝国统治》(*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①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220页。同样的评价也见于*Tributes to Hsiao Kung-ch'uan*, Burke Memorial Roo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November 25, 1981, pp. 15—16; Donald W. Treadgold, *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refa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现代中国与新世界：作为改革家与乌托邦主义者的康有为》(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等中英文著作。此外，除了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的论文及书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也可以找到由他撰写的条目。这些著述以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西方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广泛涉及政治多元论与政治一元论的关系、立宪主义与民主主义诸问题、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现代化问题、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乌托邦思想等等。萧公权学术思想之博厚与精深，行文之细密与笃实，对史料的钩沉及其鞭辟入里的分析，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是罕见的。此外，他对近代以来中外现实政治与世界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刻洞察与论述，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中国近代政治学研究始于清末，民国时期逐渐成熟，萧公权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中国长期以来受苏联学术体制的影响，政治学研究中断近三十年，20世纪80年代始得以恢复。萧公权在此领域锲而不舍的研究，不仅给现代中国学术界留下了一笔贵重的文化遗产，也象征着中国政治学研究从确立到挫折的一段曲折历史。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人从政治学的角度对萧公权的学术与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探讨。特别是有关他的现代西方政治理论研究的学术价值，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内容、特色及问题意识，以及他的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与基本立场，几乎无人问津。^①

① 有关萧公权的介绍、研究、回忆文章可参阅以下文献：Festschrift Hsiao Kung-Ch'uan, Edited by David C. Buxbaum and Frederick W. Mote, Hong Kong, Cathay Press Limited, 1972; Tributes to Hsiao Kung-ch'uan, Burke Memorial Roo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November 25, 1981; 黄俊杰：《敬悼萧公权老师》，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六期，1981年12月；黄俊杰：《萧公权与中国近代人文学术》，载《史学评论》第四期，华世出版社1982年；黄俊杰：《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载《台大历史学报》第27期，2001年6月；周策纵：《忘年诗友：悼念萧公权先生》，黄大受：《怀念先师萧公权教授》，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四期，1982年4月；杨联升：《关于萧公权、叶公超、赵元任三位老师》，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六期，1982年6月；徐乃力：《追念萧公权先生兼忆华大的汉学研究》，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一期，1982年8月；浦薛凤：《忆萧兄公权——夫子、才子、君子、学人、诗人、哲人》，载《音容宛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初版；汪荣祖：《传世诗文尽雅言——萧公权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载《中国文化》第六期，1992年9月；汪荣祖：《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载《燕京学报》新一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唐振常：《漫记萧公权先生》，载《读书》，1993年2月；刘建

作为一名职业政治学者,萧公权对学术的态度与陈寅恪颇为相似。^①但是,与历史学家陈寅恪不同,作为一名政治学者,他在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同时,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外政治现实也曾积极地予以关注和评论。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学者,也是一个对当时的舆论有一定影响的知识分子。作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萧公权的名字并不像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那样广为人知,但是他通过具体研究而提起的问题,却是广泛而富有深刻意味的。作为年轻时接受过西方政治理论系统训练的“职业政治学者”和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中是如何整合中西政治思想、文化遗产,对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现实持何种态度,其学术思想的特征何在?这些对于周围充斥着“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等议论,生活在世纪交叉点上的现代人而言,不能说没有切实的意义。

本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或政治思想史研究,而更接近学术史研究的范畴。因此,在关注研究对象作为政治学者与知识分子这两重身份的同时,更侧重其学术的一面。本书有两个目的:其一,具体考察萧公权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其政治判断的具体内容;其二,追踪其学术研究与西方现代政治理论及西

军:《昨日院士萧公权》,载《读书》,1998年8月

以上文献当中,对萧氏的学术特征介绍较详的仅有黄俊杰《萧公权与中国近代人文学术》和汪荣祖《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两文。黄氏论文将萧公权视为“文化折衷主义者”,认为其“学术世界的外部特征”表现为“中西文化的折衷”、“旧学与新知的贯通”、“感情与理智的融合”;“思想的内部特征”表现为“道德优先”、“返本主义”(Fundamentalism)、“对民族文化生命的重视”。《萧公权全集》的编辑者汪氏的论文除了介绍萧氏的经历与主要著述外,文后还附有“萧公权学术年表”。黄氏与汪氏皆为历史学家,对萧氏的学术思想与人格魅力都有独到的理解与切实的体认,但因两者都不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着眼,与本书宗旨异趣。

有关萧氏著作的中文出版情况,《萧公权全集》的编辑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自1979年开始着手,计划中的九册已出版六册。第一册《道高犹许后生闻——自传、书信、谈话录》、第三册《政治多元论》(译文)、第六册《十九世纪之中国乡村》(译文)尚未出版。据编辑者介绍,第一册以《同学录往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为主要内容,因“书信”等尚未收集齐全,近期出版可能性较小。第三册及第六册因翻译困难,暂时搁置。此外,《自由的理论与实际》一书系笔者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偶然发现,经汪荣祖先生确认,确系萧公权本人著作,但全集编辑当初未能言及。

① 有关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特征,可参阅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10月版;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人与文明》,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第30—33页。

方政治学者的关系,思考其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判断背后隐蔽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特征,阐明其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书将依时间顺序考察、分析其主要著述及其学术思想。

序言部分简述萧氏家庭环境及其学术背景。第一章追述政治多元论对中国现代政治学界、美国政治学界的影响,重点考察《政治多元论》的具体内容,以萧氏与现代西方政治学者的关系为线索,思考其西方政治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特征。第二章考察萧氏有关学术与政治的部分言论及其政治判断的具体内容,探讨其“自由社会主义”理念的内涵与意义,并思考其学术立场。第三章略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背景,重点考察、分析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要内容及其特色,探讨其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特征。第四章考察、分析萧著《中国乡村》及其对戊戌维新和康有为研究的具体内容和其意图,探讨其治学方法、问题意识及其文明观。跋的部分将回顾萧氏政治学研究的总体特征,思考学术“综合”的问题。

CONTENTS 目 录

序 家庭环境与学术背景	1
第一章 宪政的伦理基础:《政治多元论》 及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4
第一节 《政治多元论》的写作背景	5
一、中国政治学界与政治多元论	5
二、美国政治学界与政治多元论	8
第二节 主权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多元论》的主要内容与特色	12
第三节 《政治多元论》的影响、评价及其研究方法论	29
第二章 理念与现实之间:一个政治学者的政治思虑	36
第一节 学术与政治	37
第二节 一个政治学者的政治判断	41
一、宪政与“训政”	41
二、选举、政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	52
三、外交、国防、国际政治	57
第三节 “自由社会主义”的理念	61
一、两种“民主”	61
二、“自由社会主义”的内涵	64
三、“遂生达意”的自由观	69
第三章 反思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 与中国政治思想研究	76
第一节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背景	77

第二节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内容与特色	81
一、	本书的结构与时代划分	81
二、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要内容、 学术思想及其特色	83
第三节	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问题 意识与方法论	105
第四章	历史研究的新视野：拓展清史 研究的问题意识	114
第一节	帝制中国乡村统治研究	115
一、	准备阶段的治学方法论	115
二、	《中国乡村》的核心内容 与问题意识	119
三、	帝制中国乡村统治研究的 持续及其意义	125
第二节	戊戌维新的立体像	126
第三节	康有为研究的意图与意义	129
一、	重新评价康有为	129
二、	《现代中国与新世界》的主要 内容与问题意识	132
三、	康有为研究的意义与萧公权的 文明观	143
跋	“综合”的问题：政治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147

序 家庭环境与学术背景

萧公权 1897 年 11 月 29 日生于江西省南安县。在他出生大约一个月后母亲便因病去世。六岁时他被伯父带到四川省西部的崇庆州,从此远离故乡。萧氏家族历史悠久,恪守中国传统习俗,或从事农耕,或致力科举。这一家族于光绪中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怡丰号”的商号在当时颇具盛名。萧公权的伯父幼年时代开始学习商业,四十多岁时就任“怡丰号”重庆分店经理,励精图治。伯父对萧公权的教育极为热心,不惜重金聘请家庭教师。萧公权在六岁时开始学习《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声律启蒙》、《千家诗》。其后,在学习《论语》、《孟子》、《国语》等的同时,还学了一段英文和日文。十二岁时他还偷偷读过在父亲遗物中发现的《民报》。

少年时代对萧公权影响较大的是他的家庭教师何笃贞。在何师为期五年的悉心教导下,他不仅通读了《十三经》,精读了《纲鉴易知录》,还养成博览的习惯与作文的能力。何师虽不主张“保皇”,却颇尊孔。每天,萧公权与他的两个堂姊妹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深鞠一躬,再向老师行礼,然后才开始上课。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以后,何师以“革命非叛逆罪”为题,让学生写作时事评论。萧公权留美期间,何师还常与他通信,并以“通古今,贯中西”相勉。^①

1915 年,萧公权从四川来到上海,成为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二年级学生。当时的他虽然国文颇佳,英文却很棘手。因为学校的教材与授课大多使用英文,他便把主要精力放在英文的学习上,一年后便能够用英文写作了。在学期间,他还抱着“信仰自由”的立场,与其他学生一起反对过校方强制施行的基督教礼拜。^②

^①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22 页。

^② 同上书,第 23—29 页。

1918年8月，萧公权考入当时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成为高等科二年级学生。在学期间，他向《清华周刊》投稿，参加五四运动，还编辑过《民钟》日报。不过，当时的他既反对“打倒孔家店”，也反对“全盘西化”，认为“救国必先读书”^①。

1920年，二十四岁的萧公权开始了为期六年的留美生涯。滞美期间，他起初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在政治学者萨拜因(G. H. Sabine)教授的示意与指导下，完成了有关政治多元论的硕士论文。其后，他放弃到哈佛大学学习的机会，在萨拜因教授的推荐下，选择萨氏的母校康奈尔大学，从师哲学家狄理(Frank Thilly)教授，专心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此期间，他除了深入研习“德国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伦理与政治”、“美学”、“希腊哲学”、“英国哲学”等课程，出色完成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还利用课外时间学习了小提琴、钢琴、音乐理论、作曲技巧、水彩画、油画等。他认为，只有南宋以后的理学家才教人“正襟危坐”，其实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六艺”当中即包括“乐教”，孔子本人也曾弹琴放歌。^② 萧氏长于古典诗词，曾与吴宓、朱自清等诗友唱和，结集出版《迹园诗稿》、《画梦词》，后合成一册，名曰《小桐阴馆诗词》，收入《萧公权全集》之二。

1926年他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辗转于中外高等院校，先后执教于南方、国民、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京、四川、光华、政治、台湾、华盛顿(西雅图)等大学，从事过法哲学、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制度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68年5月31日，在结束华盛顿大学最后一次授课之际，他面对挤满教室的学生，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話：

当五十六年前一个春天，名哲学家兼诗人的珊达雅纳(George Santayana)正在哈佛大学授课的时候，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槛上。他注视这鸟一下，回过头来对他的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于是宣布下课，跟着向学校辞职，退隐著书。他那时年纪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悠然而逝。我没

^① 萧公权：《同学谏往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9页。

^② 同上书，第43—68页。

有资格学珊达雅纳。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听见的秘密。照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家邵雍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一一完全重现重演。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会面吧。^①

珊达雅纳曾以“苏格拉底的信徒”(a disciple of Socrates)自居。^② 萧公权如何评价其人的学术与思想,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从上述讲话中不难察觉萧氏本人对自己长达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的依依眷恋之情。他大概对自己作为教师与学者的一生颇感欣慰与自豪吧。

① 萧公权:《问学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页。

② G. Santayana, *Soliloquies in England and Later Soliloquies*, 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1922, p. 259.

第一章 宪政的伦理基础：《政治多元论》 及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多元论或多元主义(Pluralism)这一概念常见于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也称多元国家论,不仅是20世纪初期欧美政治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其后也曾在日本及中国学界风靡一时。多元国家论相对于一元国家论而提起,围绕“主权”的论争构成其理论的核心,不管从国家、社会、个人二者的关系还是从法与国家的关系来看,抑或是从冷战后世界格局下国民国家(Nation State)本身是否依然具有正统性的角度来说,都有必要重新探讨这一理论的意义及其得失。另外,如果重新思考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政治多元论也是不可忽视的理论之一。^①

萧公权留美期间专攻政治哲学,主要研究对象为西方现代政治理论。《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是他留美期间的博士论文,1927年作为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由伦敦和纽约的出版社同时出版,迄今没有中文译本。归国后,他虽然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上,却时刻关注着现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变化与发展。本章将在考察当时中国及美国政治学界如何对待政治多元论这一思潮的基础上,重点研讨萧氏《政治多元论》的内容与特色,探究其历史背景及现实意义。同时,也以萧氏与西方现代政治学者的关系为线索,思考其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问题意识

^① 有关“重建”政治多元论的议论可参阅 A. David I. Eisenberg, *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Plural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5; 有关政治多元论与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关系可参阅 Adam B. Ulam,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nglish Socialism*, 1951。此外,以政治多元论为“第三条道路”的论点可参阅 Paul Hirst, *From Statism to Pluralism*,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1997, p. 2。

及其方法论特色。

第一节 《政治多元论》的写作背景

一、中国政治学界与政治多元论

清末,西方政治学说开始传入中国。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已经言及英美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但是,当时的洋务派关心的是船坚炮利、“科技”兴国,未尝留意于西方的思想观念及其政治制度。甲午海战的失败,使当时的许多士人痛定思痛,迫切意识到彻底变法的必要。严复(1854—1921)、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此期间,涉及西方政治与法律的书籍与杂志也大量问世,如《西政丛书》、《万国公报》、《清议报》、《民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后更名为《政法学报》)、《法政杂志》等便特别引人注目。^①

清末士人对西方政治学说与制度的关心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专制与民权、国家与民族……这些问题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决非纸上谈兵。有关西方政治法律的理论 and 制度受到广泛的关注。除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边沁、密尔等人的学说,如进化论、德国的国家学、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学说、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也广为传布。^②

① 对中国近代政治学的接受、确立、挫折之历史过程的研究可参阅以下文献:杨幼炯:《我国政治科学之肇端与发展》,载《当代中国政治学》,胜利出版公司印行1947年1月初版;杨幼炯:《中国政治科学之史的发展》,载《当代政法思潮与理论》,台湾中华书局1965年版;郭廷以:《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输入——晚清译书与西学》,载《近代中国的变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马起华:《中国政治学史论》,载《政治学报》第四期,中国政治学会编集,1975年9月;吕亚力:《我国政治学的现况与展望》,载《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回顾与展望》,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的复活》,载《创价法学》第13卷3-4合刊(1984年);宝成关:《论辛亥时期西方政治学说的引进与传播》,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Zhengyuan Fu, "The sociology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 Comparative Survey*, Edited by David Easton, John G. Gunnell and Luigi Graziano, London and New York, 1991.

② 参阅宝成关上述论文及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六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如果说这些活动还大多停留于翻译、介绍的阶段,那么严复的《政治讲义》可以说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其中所表明的主观把握政治现象的意图已经极为明显。因此,视《政治讲义》为中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开山之作并不为过。^①另一方面,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1903年已经将“政治学”列为正式教学科目。^②1915年12月5日“中华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翌年,《政治学报年刊》作为学会刊物出版^③,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逐步得到社会承认。同年在北京出版英文刊物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此刊物作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杂志之一,此后连续编辑二十多年,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政治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萧公权也曾一度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④

20世纪20年代末,一些大学开始设立政治学系,接受过系统政治学训练的部分学者从国外归来,中国正式开始了现代政治学教育。30年代,政治学学科内部开始进一步细化。以当时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为例,该系除了设有政治学概论、西方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现代政治制度、政党论、国际关系、中国近代外交史、行政学原理、市政学、中国政府、地方政府、近代政治思潮、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之外,还有关于柏拉图、卢梭政治哲学的专题研究。^⑤这样的学科设置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也得以保留。^⑥到1948年前后,据说全国范围内约有四十所

①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人与文明》,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第348—354页。

② 庄吉发:《京师大学堂》,国立台湾大学1970年版,第52页。

③ 关于中国最早的政治学会的成立,据马起华、赵宝煦上述文章及《杭立武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6月)中的记载,均为1932年。笔者调查结果如上所述。有关成立过程、学会章程、会员构成及其活动的详细记载参见《政治学报年刊》(出版地不详,1916)。Paul Samuel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1922, pp. 235, 265。据《政治学报年刊》所载严鹤龄《政治学会并政治学报之缘起》一文记载,其发起人为 Paul Samuel Reinsch、严鹤龄、顾维钧、伍朝枢等人。中华政治学会以当时的美国政治学会为蓝本,以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行政学的研究为宗旨。会员录中除了像严复这样有声望的中国学者外,还可以看到 W. W. Willoughby、贺长雄等欧美日本学者的名字,调查中还看到以下材料:Paul Samuel Reinsch, “Th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I, No. 1, Peking, 1916

④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⑤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⑥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院校设有政治学系。^①

虽说此时政治学研究沿着系统化、专门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但学界关心的问题并不因此脱离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不管是政治学者之间展开的民主与独裁、集权与分权的争论,还是专家学者对地方自治、市政、主权思想、中国外交史的专门研究,都与当时中国的国内、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因专业分工而深化的问题意识,往往被误解为游离于现实世界,其实未必如此,相反这种问题意识往往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现实环境的某种制约。^② 政治多元论之所以成为 20 世纪 20、30 年代中国政治学界的重要话题之一,这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政治现实不可谓没有直接的关系。

鉴于辛亥革命并未撼动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五四运动起初格外关注思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但后来渐渐意识到政治问题的不可避免性。^③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论战、无政府主义与“新村主义”的流行、以“好政府主义”为代表的改良主义的主张……这些都需要坚实的政治理论作为后盾。此外,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联省自治运动”的兴起、国家主义者的活动、“乡村建设派”的诸种尝试,也迫使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关系。政治多元论可以说恰好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思想空间。

政治多元论何时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话题,这一点今天并不十分清楚。但是至少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战过程中,已经有所谓“主权两分”的词句出现。^④ 在此前后,除了有人介绍霍布豪斯(L. T. Hobhouse)的国家论以外,还有人专门分

① 参见前引赵宝煦论文。

② 关于政治学的发展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可参阅 S. H. Sabine, "What Is a Political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s*, I, 1939; 石田雄:《日本的社会科学》,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4 年版;邹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科学》,载《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③ 参见野村浩一:《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岩波书店 1990 年版。

④ 《新青年》九卷六号(1922 年 7 月 1 日发行),第 31 页。

析了柯尔(G. D. H. Cole)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观。^①张奚若在1925年发表的《主权论》一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狄骥(Léon Duguit)、拉斯基(H. J. Laski)的主权论。^②1926年7月的《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刊载了美国政治学者韦罗璧(W. W. Willoughby)的论文《政治多元论者》(*Political Pluralists*)。文中在介绍政治多元论者菲吉斯(J. N. Figgis, 1866—1919)、拉斯基(H. J. Laski)的同时,还介绍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福利特(M. P. Follett, 1868—1933)的《新国家》(*The New State*)以及工团主义的思想,此外也谈到了萨拜因(G. H. Sabine)对政治多元论的看法,同时也表明了作者自己的观点。^③1930年前后,狄骥、拉斯基、柯尔、麦基弗等多元论者的观点和著作不断被介绍翻译到中国,对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冲击颇大。^④

对政治多元论的接受,虽说当时学界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就像对待其他新思潮一样,同样缺乏学理上的充分探讨,表现出某种食洋不化、不求甚解的毛病。与此相反,萧公权的《政治多元论》却先于此种流行,其先见之明与客观冷静的研究态度,使这一著作成为探讨政治多元论的里程碑式的历史文献。该书不仅在本世纪初得以再版,时至今日,仍有一些探讨多元论问题的著作引用该书中的相关内容。^⑤

二、美国政治学界与政治多元论

有关“派阀”、“利益群体”以及党派的多样性等话题,在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已初露端倪。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的乡镇(township)组织和精神以及结社问题也有很多评论。20世

① 翟俊下:《Hobhouse的国家观》,载《学林》第一卷第一期,北京学林杂志社1921年9月版;高一涵:《柯尔的国家性质新论》,载《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国立北京大学1923年2月版。

② 参见张奚若:《主权论》,载《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W. W. Willoughby, "Political Pluralists,"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 No. 3, Peking, 1926.

④ 详细情况参见杨幼炯:《我国政治科学之肇端与发展》,载《当代中国政治学》,胜利出版公司印行1947年1月初版;杨幼炯:《中国政治科学之史的发展》,载《当代政法思潮与理论》,台湾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⑤ John G. Gunnell, *The Descent of Politic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 292; A. vigaid I. Eisenberg, *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Plural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5, p. 199.